国门开

凌晨 3 点，美国白宫的电话骤然响起，总统吉米·卡特从睡梦中被惊醒。电话来自北京，打电话的人是总统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国访问。

“总统先生，我实在不愿意打扰你休息。”普雷斯说。

“肯定是发生了危机。”卡特判断道。

“不是，我正和邓小平副总理会见，他问了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

“当然可以。”

“他问能不能派 5000 人。”

“你告诉邓小平，他可以派 10 万人。”

2008 年 12 月，在中美建交 30 周年前夕，卡特接受中国媒体集体采访时，回忆起北京时间 1978 年 7 月 10 日发生的这一幕。

“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就派 5000 人，第一批只有 50 人。”2011 年 11 月 15 日，在北京中关村的办公室内，美国加州大学北京中心主任唐占晞（John Thomson）说。33 年前，他是美国驻华联络处一等秘书。

中美两国领导人达成互派留学生的共识后，两个承担具体工作的人，成为中美双方落实政策的直接接口。美方就是唐占晞，中方则是教育部外事局出国处工作人员郭懿清。

33 年后，他们几乎同时关注到中国媒体在 11 月 15 日集中报道的一条新闻——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 14 日发布的“开放门户”报告显示，在 2010/11 学年度，美国共招收国际留学生 723277 人，其中中国留学生人数为 157558 人，比上一学年度增长 23%。这意味着自去年留美学生数量首次超过印度以来，中国连续第二年成为赴美留学第一大生源国。

“当时没有人想到中国会同意跟美国互派留学人员，也没有人会预料到，30 多年后这个数字会从 50 增加到 15 万这么多。”唐占晞一边往自己的菊花茶里加糖块，一边感叹说。

这位美国前外交官精通汉语，了解中国人 100 多年来的留美历史，也曾亲历中美高层之间有关留学事务谈判的现场——那是一个一度封闭的大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推开国门的瞬间。

一扇多年敲不开的门

上世纪 60 年代初，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 John Thomson 访问台湾后，对中国文字和文化产生兴趣。他开始学中文，并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唐占晞”。

“当时美国很少有人学中文，对我们来说，苏联很恐怖，是第一个不能去的地方，而中国大陆也是个陌生而可怕的地方。”唐占晞回忆。

他要深造中文，能选择的地方只有台湾和香港，因为“不想去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也不让进”。1966 年，他成为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留学生。

海峡对岸，原本只对苏联、东欧开放的留学之门，此时也彻底关闭。为使拟留学出国人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进一步得到锻炼和提高”，1966 年 6 月 30 日，负责留学工作的高等教育部向全国下发通知，“经请示中央批准，今年选拔、派遣留学生的工作决定推迟半年进行”。

“半年”的时间，最终变成了 12 年。“文革”10 年期间，中国仅仅向 21 个国家派出 337 名留学生。

“这些所谓的留学生，实际上都是语言生，跟 1978 年之后以理工科为主的留学生，并不大一样。”2011 年 11 月 29 日，郭懿清在家中回忆说。

1973 年，33 岁的南开大学外语系教师郭懿清曾作为考察团成员赴美，教育部派这个 8 人团赴美考察的内容，仅限于语言教学。

此时，她未来的合作伙伴唐占晞，已从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专业硕士毕业，担任美国新闻总署驻台湾新闻处新闻官。那两年的局势变化，让唐占晞有些眼花缭乱。

1972 年 2 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第二年，美国在中国大陆设驻华联络处。但 1974 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中美关系变得扑朔迷离。

“美国国内政治不管怎么变，一个愿望一直没变，就是跟中国进行学术交流，交换学者、学生。美国认为这是加深互相了解的最好方法。”唐占晞说。

1974 年前后，一些美国教授开始给北京的一些大学和 1949 年前曾留美的教授写信，“希望到中国做研究，交流合作”。但无论是给自己的中国学生写信的美国教授，还是直接与大学联系的美国教授，在一番焦急等待后，都未能收到回信。

“中国正在‘文革’，美国又发生了‘水门事件’，而且中国正讲阶级斗争，大家很怕涉外事件。中美还没正式建交，跟美帝国主义合作，谁敢说？不敢。敢说就有人给你戴帽子。”唐占晞搅着他的菊花茶这样自问自答。

虽然身在台湾，但唐占晞在 1976 年得知，民间机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当时正跟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合作，每年互派几个考察团，在图书馆、工程教育、科技等方面进行交流。

考察团的美国成员回国后，很快便会给刚认识的中国同行写信，建议“应该交换学生，开始研究交流”。依旧没有回音。

唐占晞的印象是，“美方一直提出要交换学生，中国一直没有接受”。郭懿清 1976 年被借调到教育部外事局出国处，她也记得当时的情形，“美国一直想跟中国交换学生，咱们一直没答应”。

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1978 年 6 月的一天，被调往美国驻华联络处的唐占晞一大早从台湾出发，辗转香港、深圳，当晚 9 点半左右从广州飞抵北京首都机场。

就在唐占晞赴任的这个月 23 日，邓小平决定专门安排时间，和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一起，听取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达有关学校各项工作清查整顿情况的当面汇报。

“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现在我们迈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大学水平，一方面派人出去学习，这样可以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究竟办得如何。”

邓小平当场作了这一后来被称为“扩大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重要讲话”的表态，并指出：“不要怕出一点问题，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即使一千人跑掉一百个，也只占十分之一，还剩九百个。”

教育部外事局随后专门开会，传达讲话精神。郭懿清回忆，“会上听到这一消息后，我们特别振奋。”

不过，这个消息当时并不为唐占晞等美方人员所知。

7 月 7 日，美国总统卡特的科学顾问普雷斯博士率领美国科技代表团与方毅在人民大会堂会谈。

对互派留学生一事，美方只是作为谈判筹码，并不抱太大希望。普雷斯在上午提出可以互派留学生时，中方并未给予回应。但下午会谈即将结束时，方毅突然提出，中国政府要谈的最后一项，是 1979 年想先派 500 个学者到美国进修学习。

唐占晞作目瞪口呆状，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方毅的话被翻译后，美方人员有那么片刻愣住了。坐在方毅正对面的普雷斯，用手碰了碰身旁随行人员，低声问，“有没有这方面的预算？”他得到的是否定的答案。

“Who will pay（谁出钱）？”普雷斯抬起头，严肃而略带困惑地问。

方毅随即告诉他，“费用由中方来付。”在当天的欢迎晚宴上祝酒时，方毅说，希望中美双方在科技交流和合作方面，“步子要迈得更大一些，路子要开得更宽一些”。

随后两天，带着谈判时获得的“惊喜”，来自美国科技、农业、地质和卫生等研究机构的代表，分头开始跟中国同行商谈合作交流事宜。

7 月 10 日，在会见普雷斯时，邓小平强调，美国的科学技术在很多领域比其他国家先进，中国已经大大落后，迫切需要获得帮助，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唐占晞回忆道：“邓小平说，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科技知识，美国是最先进的国家，应该帮助我们。他提出派人到美国学习。”

随即，卡特总统在凌晨 3 点接到了普雷斯的紧急越洋电话。

美方没有料到，中国竟然会主动推开这扇留学之门。

“红色中国”要派学者到美国来？

邓小平发表讲话后不到 20 天，教育部便完成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确定了选派计划。

但在普雷斯回到华盛顿近 3 个月后，中美双方有关教育合作交流的工作协议还没有达成。普雷斯向方毅发出邀请，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赴美商谈有关留学人员的事宜。

这件事，让唐占晞第一次到了位于北京西城的教育部。

走进大木仓胡同，唐占晞看到一栋五六层的红砖楼，不少玻璃已经被打碎，大门外面挂着的教育部的牌子却很新。

“什么人？要干什么？”看门的人问。

“美国驻华联络处一等秘书。”唐占晞回答，同时递上名片。

看了一眼名片，看门人朝大楼里面喊了一句，“美国一秘来了。”楼里面的人接着喊，“美国一秘来了”。看到唐占晞进来，里面的人也跟着喊，“美国一秘来了”，直至唐占晞走进接待室。

经过商谈，中国教育代表团定于当年 10 月访问美国。35 年前曾留美的中国科协代主席、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担任代表团团长，教育部副部长李琦则以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代表团顾问的民间身份出访。谈判的对手则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理查德·阿特金森、国际交流署署长以及白宫、国务院的有关人员。

在华盛顿的谈判进行得异常艰难。双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留学生人数和专业范围。

反复商谈后，双方同意，“在 1978 至 1979 学年，美方接受中方 500 名至 700 名留学生、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中方接受美方 60 名留学生、访问学者”。

会后，唐占晞接到通知：“明天到白宫旁边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找罗宾逊先生。”

第二天，唐占晞一走进罗宾逊的办公室，就看见房间墙壁上的一块黑板，上面写着 120 多个苏联人的名字以及他们的专业。当时，美苏之间进行一对一的交换学者。跟中国则没法这样交流，因为中国的人选不是按人而是按学科门类来划分。

“听说‘红色中国’要派学者到美国来，怎么回事？”罗宾逊问。

“白宫要开始跟中国交流。”唐占晞答。

“多少人？”

“第一批，500 个。”

“哦，黑板不够大，写不下。你明天再来讨论吧。”罗宾逊耸了耸肩告诉唐占晞。

次日，唐占晞发现开会地点改在一个小会议室。一番自我介绍后，他才知道坐着的 10 多个人来自空军、国防部、联邦调查局（FBI）、中央情报局（CIA）、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等部门，大都是情报人员。有些部门，这个海军陆战队前队员甚至从未听闻。

唐占晞告诉他们：“白宫方面和总统本人，都决定开始跟中国交流学者。”这些人则从国防的角度，指出有一些学术领域，外国学者尤其是苏联和中国的学者不可以涉及，并划定了一系列范围。唐占晞回忆，根据这个范围，他们设计出一个表格，以后申请留美的中国人，都需要填写各自的学术背景、研究领域等信息。

这样的研究范围限制沿用至今，并在当时让谈判陷入僵持。

接下来，李琦带人留在华盛顿谈判，周培源则带队去考察美国的大学。

在美方眼里，中国教育被“文革”耽误 10 年后，有些太先进的技术暂时还无法在中国运用，因此中国学生除了在名校学习外，还可以到一些社区大学学习。但中方明确表示，中国留学生只进美国的一流大学，学美国的一流技术。

访问哈佛大学时，校方派出的接待者是医学院院长。

“我们来的是科协主席、北大校长，是名望那么大的周培源周老。他们等于是派个二级学院的领导出来接见。我们觉得太不尊重我们了。”郭懿清回忆说。

会见过程中，周培源出来上厕所，看到会场外的郭懿清，便问：“小郭，礼品还送吗？”

“不送了。”郭懿清随口回答。

“对！不送了！”周培源说。

那期间，代表团成员讨论问题时，常常跑到院子里去，认为户外不可能被窃听。

在美国停留 13 天后，代表团终与美方达成 11 项“口头谅解”，并议定，“双方鼓励两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学者之间进行直接接触”。

这个并没有实质性内容的议定，在 1979 年中美正式建交之后，起到了美国人意想不到的作用。

唐占晞后来了解到，那些曾在 1974 年前后给中国写信的美国教授，在 5 年以后终于收到了回信。信的内容大同小异：教授，谢谢您 1974 年来函要求交流，我们很想交流，但要等到时机成熟以后才能做，现在我们认为时机成熟了。

建交之前，第一批留美人员必须到美国

时机的确已经成熟了。代表团回国后，教育部的首要任务，是选拔出首批 50 名留美人员。

在与教育部外事局时任副局长胡守鑫熟悉之后，唐占晞问他：“胡先生，你们怎么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找到 50 个人的？”

“我们抓人。”

“怎么抓？”

“我们开着面包车，到中关村的大学和研究所，走进办公室就问，你们这里谁又红又专又有英语基础？人被叫来后，我们问几个问题，挥挥手说，好，上车。经过几天思想教育，告诉他们这次到美国留学符合国家政策，然后就送到使馆来。”胡守鑫笑着说。

唐占晞对胡的话至今信以为真。不过，在具体做选拔工作的郭懿清眼里，生前说话一直很幽默的胡守鑫，是在跟唐占晞开玩笑。实际上，这 50 个人是通过英语考试、业务考试和政治考核后，严格选拔出来的。他们原定在 1979 年 9 月赴美。

1978 年 12 月 16 日，中美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从 1979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建交。

唐占晞当天就接到教育部打来的电话。对方口气很着急，“唐先生，请您马上到教育部来一趟。”

“有什么急事吗？”

“邓小平同志昨天亲自打电话给部长，要求建交之前，第一批留美人员必须到美国。”

唐占晞和郭懿清开始手忙脚乱起来。

英语考试，60 分及格，但真正能考到 60 分以上的不多。有几个考到八九十分的，要么本人是 1949 年前从教会学校毕业，要么他们的导师 1949 年前曾在英美留学。

李琦非常重视人员选拔，明确表示：“第一次往美国派留学人员，必须保证质量，政治上要过硬，业务能力要强。”

最终，外事局确定了 50 人的名单，其中女性不到 10 人。郭懿清等人开始正式下达集训通知。

这 50 个人被送到设在北京语言学院的出国人员集训部集训。集训期间不能请假，还要经常就集训内容进行严肃讨论。

集训内容除了国际国内形势、留学有关规定、出国外事纪律，还包括一些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生活常识——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国外报纸很多，但不能用来擦屁股，会堵塞马桶。后来，这批人出发前在国内买了很多手纸，带到美国去。因为听说在美国上厕所要投币收费，下飞机前他们甚至提前上好了厕所。

集训期间，每人得到 700 元置装费，带着证明信，便可在专门给留学人员做服装的出国人员服务部选衣服。他们被一辆大巴车统一拉到王府井百货大楼背后的服务部后，尽管被告知可以自由选择，但几乎都做了同样的选择——当时国内最好的黑色“银枪呢”大衣，还有一样的西服，一样的皮鞋和包。

后来，他们又被拉到美国驻华联络处办理签证。唐占晞看到，车上下来的 50 个人，大多穿着涤卡中山装，所有的纽扣都扣得紧紧的。

面试前，唐占晞扯了扯签证官的衣袖：“嗨，这些人没有问题，你放心。”

随后，他听到了这样的问答。

“Which school are you going to（到哪个学校去）？”

“Chemistry（化学）。”

“Oh，what subject will you study in America（打算到美国研究什么）？”

“Born in 1933（生于 1933 年）。”

“OK，very good（好了，很好）。”

“他们大都 40 岁左右，不少人英文很差，可能事先背好了答案。不过还是给了他们签证。”唐占晞回忆说，为这 50 个人拿到签证，是他的任务。

周培源在北大的学生姜伯驹和张恭庆，当时恰好获得美国的奖学金，即将去进修。外事局觉得，虽然这两人不由中方出钱，但也应纳入公派留学队伍。首批留美人员，于是变成 52 人。

国家派你们来不容易，你们学成后要回国

1978 年 12 月 26 日晚上八九点，下着雪，一架飞机静静地停在首都机场停机坪上。一群穿着黑大衣和黑皮鞋、带着黑色手提包的人，顺序登上飞机。

与他们一一握手的送行者包括周培源、李琦、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当然还有郭懿清和唐占晞。当天上午，方毅副总理专门接见了这 52 个人。

“他们看上去都一模一样，名字一个也没记住，只记得当时雪花飘飘的。”唐占晞回忆。

12 月 31 日，是个星期天，美国驻华联络处工作人员还在休息，但中国科学院一早便打来电话，请伍德科克当天上午到友谊宾馆，接受他们的科技合作文件草稿，“因为邓小平下的命令，留学的事一定要抓紧时间办”。

第二天，中美正式建交，邓小平来到伍德科克大使官邸。两人会谈时，唐占晞为大使翻译。

20 多天后，邓小平将访美。为此，中方希望美方提供相关的经济、地理、政治、历史、教育等资料。这需要刚上任的新闻与文化参赞唐占晞去负责操办。

1979 年 1 月 31 日，邓小平访美期间与卡特总统签署关于派遣留学生的正式协议。签署协议前，邓小平在中国驻美使馆接见了留美人员代表。

52 名留美人员还应邀参加总统夫人为邓小平夫人卓琳举办的招待会。他们把大衣脱下来堆放在一张大桌子上，结果这些出国前购置的大衣，除了大小不同外，样式颜色都一样，无法分清，出门时穿错了很多。

招待会后，卓琳把他们叫到一起，告诉他们：国家派你们来不容易，你们学成后要回国，你们要是不回去的话，小平同志要着急的。

唐占晞的工作则是继续鼓励中国人走出去。他准备了 15 套介绍留学美国的资料，在同助理研究了中国地图之后，他决定向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以及其他十几个城市的图书馆各送一套，以提供公共借阅。

一年后，唐占晞先后到其中几个城市出差，顺便想看看资料的使用情况。结果他发现，在一些图书馆，资料封面已被摸破，里面也被翻得十分破烂。而在另一些地方，这些资料从来没人翻阅。图书馆工作人员告诉他，“这套资料非常珍贵，我们锁起来了”。

当时，唐占晞不管到哪个地方，对方介绍情况时，第一句话总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我们现在还处在一种落后的状况。“到哪儿开头都是这样念，然后结尾是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四个字还很少提到。”唐占晞边说边挺直身子，模仿那些人拿着纸念稿子的样子。

但他也发现，“中国报纸上登的文章一直在说，路线要转变”。他当时对“改革开放”四个字的理解，就是让中国人跟外国人接触，跟外面交流。

在他看来，当时这种交流非常困难，但又非常必要。在送走和迎来中美双方第一批留学人员后，唐占晞还要落实美国的“国际访问计划”，即每年选几十个中国人到美国访问，包括媒体、教育等方面的人士。

第一批，他邀请了北京 5 家有影响的媒体的国际新闻编辑。他当时想，“媒体很重要，访问美国后，可以写文章报道，传播信息。”出发前，唐占晞和美国使馆的几个官员请这几位编辑吃饭，跟他们确定访问路线，并安排在各个地点的访问内容。

在唐占晞看来，媒体人士一定要访问纽约，因为那里是美国的媒体中心。他介绍完纽约的情况后，问眼前的编辑：“你们到纽约想看什么？”

编辑们相互拐了拐胳膊肘，确定由一位稍微年长者发言。他非常郑重地说：“我们到纽约去，最主要是想了解纽约市党委怎么控制《纽约时报》。”

“我当时告诉他们，美国有两大党，但《纽约时报》不属于任何一个党，跟政府没有关系。但他们不相信，一脸疑虑。”唐占晞回忆。

当他告诉几位编辑“美国总统有权力，但没钱，总统的预算必须得靠国会批准，国会不批准，总统就没钱”时，同样遭到了怀疑。

百年串起留美历史

33 年前的那个雪夜，在首都机场，看着 52 个“几乎一模一样”的中国人离开祖国赴美，唐占晞不由自主地想起前溯一个世纪的那群留美幼童。

120 名幼童，由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容闳倡议，被清政府派遣赴美。他们坐着蒸汽轮船一路向东，需要经过 25 天左右的颠簸。100 多年后，他们的后辈则坐着飞机向西，经巴黎中转，只需 30 多个小时的飞行。

“当年詹天佑他们，都是中途被搞回来了的。这些人……”送别这 52 个人时，唐占晞在心里嘀咕。

与幼童留美计划中途夭折不同的是，现在这扇被推开的门不会再关上了。两年多以后，当唐占晞离任时，已经有几千个中国留美人员在美国，也有两三百个美国学者和学生在中国，还有 80 个美国大学跟中国大学或研究机构签订了交流协议。其中大多数的交流，是因为有美国大学的老校友在中国，或是中国大学的老校友在美国。这些在 1949 年前留学的校友此时成为纽带，不仅他们和母校恢复了联系，也让学校与学校之间建立起合作关系。

“除了官方，民间交流已经很深入。万一两个国家的关系又搞不好，官方交流发生困难时，我相信，还有这么多桥梁可以沟通，不会再像 100 多年前那些留美幼童那样。”唐占晞说。

其实，在那 52 名留学人员走出国门之后，到 1981 年，中国政府已经与英国、埃及、加拿大、荷兰、意大利、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国政府达成交换留学生协议。

也是在这一年，由唐占晞负责，中美之间中断了 32 年的富布莱特项目重新启动。经许国璋推荐、唐占晞面试后，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师梅仁毅成为第一个富布莱特访问学者。

中国人的留学之门再一次被完全打开。首批 52 名留美人员，除一人延期外，均在两年后按时归国。他们后来大多成为中国科技领域的领军人物。

如今，当年的出国人员集训部，已经更名为培训部；曾为首批留美人员订做衣服的出国人员服务部，已经成为王府井百货大楼商场的一部分，不复存在。

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思想已经发生了让唐占晞们“想都想不到”的改变。那 52 个人的档案，作为真实的历史记录，被存入国家档案馆。

（据《中国青年报》 文/王波）

1979 年 1 月，邓小平访美，白宫草坪上的欢迎人群中就有中国首批 52 名留美人员。

1978 年 12 月 26 日上午，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专门接见 52 名留美人员。